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2.04.015

苏州地名源流考

彭雪开^{1, 2}

(1.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 湖南 株洲 412007; 2.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苏州古称勾吴, 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约公元前11世纪, 泰伯、仲雍自陕西“南奔”, 建立勾吴, 其后裔被周武王封为吴伯。其南奔路线, 最有可能取“商於古道”, 奔至今江苏晋江市一带筑城族居, 后与古越部落融合, 创造了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湖熟文化”。吴国建都后, 不断向东南迁徙, 最终定都于姑苏(今苏州古城)。姑苏之“苏”, 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秦置会稽郡, 治吴县, 后有吴州、苏州之称, 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关键词: 勾吴; 会稽; 苏州; 姑苏; 地名源流

中图分类号: K928.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2)04-0115-06

引用格式: 彭雪开. 苏州地名源流考[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4): 115-120.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Suzhou Place Names

PENG Xuekai^{1,2}

(1. Research Base of Institute of Place Names, Ministry of Civil Affairs, Zhuzhou 412007, China;

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412007, China)

Abstract: Suzhou was called Gouwu in ancient times, also known as Gongwu, Juwu, Gongwu and Gusu. In the 11th century BC, Taibo and Zhongyong “ran south” from Shaanxi and established Gouwu, and their descendants were named Wu Bo as vassals by Emperor Zhou Wuwang. Its southbound route was most likely to take the “ancient road of commerce”, and it went to Jinji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and lived there, and later joined with the ancient Yue tribes, creating a “Hushu culture” with a civilization level no less than that of the Zhongyuan culture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fter Wu established its capital, it migrated to the southeast, and finally made its capital in Gusu (now Suzhou Ancient City). Gusu’s “Su” is probably the place name of the Chengyitai in Yue language. It was set in Kuaiji County, Qin Dynasty, and governed Wuxian County, later known as Wuzhou and Suzhou, all of which hav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origins.

Keywords: Gouwu; Kuaiji; Suzhou; Gusu;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place names

苏州, 古称有勾吴、工吴、句吴、攻吴、姑苏之别。前者始见于唐代李白《溧阳濑水贞女碑

铭》; 后四者依次见载于《左传·哀公七年》、东周金文《攻吴王夫差鉴》及《史记·吴太伯世家》《国

收稿日期: 2022-03-06

作者简介: 彭雪开(1953—), 男, 湖南攸县人, 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科研基地首席专家、研究员, 湖南工业大学教授, 研究方向为地名历史文化。

语·吴语》;但未释其名,其《吴太伯世家》注引,也极为简略,谈不上研究。苏州释名,始于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苏州》,但仅言“因姑山为名”。自此以后历代辞典、词典、国史、方志、地志,皆以此为据,无有详考。20世纪70年,周生春先生发表《姑苏考》,开苏州地名具体考释之先河;但此文仅从地名词源进行考释,并未涉及苏州地名的生成、沿革、演变及其原因。2011年后,苏州市出版《江苏省苏州市地名录》(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05年版)及《苏州市吴文化地名保护名录》(福建省地图出版社,2015年版),其涉及苏州地名由来、沿革、演变,但并未对其进行专文探讨,苏州地名探源,仍付空缺。

本文探讨苏州地名渊源、流变及原因。一是对勾吴及工吴、句吴、攻吴别号进行溯源,对其称名进行简释,并提出泰伯(太伯)、仲雍自陕西吴山南奔,建立“勾吴”侯国,乃沿袭“攻吴”之国号。二是对泰伯、仲雍南奔荆蛮路线及族居处,依据古文献及出土文物进行考述。三是对会稽及政区地名由来、沿革、演变原因及吴文化的生成进行简释。四是对苏州政区地名的生成、沿革问题,尤其是“姑苏”古越语华夏文译写地名本义中疑难、重点问题进行解读。以上考释,对于夯实苏州地名的历史文化之根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古越语译写地名简考

《史记·吴太伯世家》:“吴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1][221]}季历立为王季,死后其子昌继位,是为周文王。“约公元前11世纪,周族首领古公亶父长子泰伯、次子仲雍(又称虞仲)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2]当地土著千余家归附之,被周武王追封为吴伯,故称吴太伯。

勾吴,亦称工吴、句吴、攻吴、姑苏。勾吴,为后起地名,始见于唐代李白《溧阳濑水贞义女碑铭》:“子胥始东奔勾吴。”后泛指吴国。工吴,见于《左传·哀公七年》载:仲雍在工吴,“断发文身,羸以为饰。”句吴,始见于《史记·吴太伯世家》;《国语·吴语》“曰吴伯,不曰吴王。”吴伯即为吴太伯。颜师古注《汉书》认为,句吴之“句为夷(越语)之发声”。攻吴,皆由春秋吴国青

铜器铭文以及东周金文《攻吴王夫差鉴》所证。“鉴”即为大盆,鉴腹内有“攻吴王夫差择吉金自作御鉴”铭文,文字质朴,已具小篆之雏形。姑苏,见载于《国语·吴语》,“越王勾践乃率中军溯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尔后《墨子·非攻中》《韩非子·喻志》皆载“姑苏”之名。

工吴、句吴、攻吴之首字,据考为越语发语词,为华夏语译写,无义。而其“吴”,当是指今陕西省陇县的吴山,因太伯弟仲雍封在吴山为侯国,故以“吴”为氏,称“攻吴”。周太王欲立少子季历及其子昌,为避贤,泰伯(太伯)便携二弟仲雍自陕西南奔,建立勾吴,仍以“吴”为国号。唯“姑苏”为古越语华夏文译写地名,历代虽各有考释,但皆难以释疑。

周武王追封吴太伯,都城何处?历有三说。一说都西吴,即在今陕西省陇县的吴山,又名吴岳处;二说都北吴,即在山西省平陆县吴城;三说都东吴,即今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梅村街道办事处。

有学者考证:吴本为族名,后成为族邑名、国名。泰伯、仲雍最初出走之地,当在西周吴仲封地(即西吴)。泰伯(太伯)、仲雍逃到此处,为吴族酋长,后立为族国“句吴”。《诗经·大雅·皇矣》:“帝作邦作对,自太伯、王季。”是可为证^[3]。古公亶父病逝时,曾遗嘱季历让位给泰伯。泰伯推让后,泰伯、仲雍便从陕西带着族人南迁,“文身断发”,成为荆蛮(古越族)一支。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太伯奔荆蛮,自号“句吴”。其当以周原附近(西吴)“句吴”为名,以示两兄弟不忘南奔之艰辛。

二、泰伯、仲雍南奔荆蛮族居地望考述

泰伯、仲雍南奔荆蛮,族居何处,多有疑义。《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吴,国号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无锡县东南六十里。”自此后,历代典籍皆以此为据,多言太伯、仲雍率族人居住在今无锡梅里,因受到当地越人拥戴为君长,号“勾吴”。东汉《吴越春秋》载:太伯、仲雍来到苏州,死后葬梅里。《后汉书·郡国志》注引云:无锡有泰伯墓。有关地方史载:无锡泰伯墓,始建于东汉桓帝永兴二年(154年),帝诏吴郡太守糜豹修筑,有民50户护守其墓。后历代王朝,皆以太牢祀。

不过，先秦文献如《论语》《左传·哀公七年》《国语·吴语》《楚辞》等典籍中，并未言明泰伯、仲雍奔吴具体位置。《史记》云：苏州是“故吴墟”。叶文宪提出，“所以在太伯奔吴的记载中显然有后人增添进去的成份，是不完全可靠的。”^[4]他进而认为，近几十年来在宁镇、皖南、苏锡一带发现西周和春秋时期的墓葬、青铜器，共有 568 件大型青铜器中，属于西周和春秋初期的 225 件，都出于宁镇地区，而苏锡地区所出全是春秋中晚期的青铜器。近年的考古成果也反映出吴、越两族墓葬文化，有明显的西、东分界线，这实际上也进一步排除了“吴都在锡苏地区”的可能性。

在今晋江市近郊丹徒、丹阳及句容等市区，出土了大型铜器墓和带铭文的铜器，这里很可能是早期勾吴国王族的墓区，“是吴国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5]由此推断：太伯奔吴应是在宁镇地区，而太湖周围则是越人活动之域，故梅里太伯墓和虞山仲雍墓，为后人纪念性建筑。

从江西省宜春市樟树市发掘的“吴城遗址”看，其极可能是太伯奔吴时所筑城邑。由此推知，太伯奔吴，是从今陕西陇县吴山或山西平陆县一带，渡过黄河，经过南阳盆地，再取“商於古道”沿汉水而下襄阳、宜城、荆门、荆州等（此路线相当于今焦枝铁路线），过长江、入洞庭湖，溯湘江入今长沙、株洲、醴陵东，入渌水，进入湘赣走廊，入今萍乡、宜春等地；亦或沿“金道锡行”的主线路，从今陕西省陇县吴山或山西平陆一带，渡过黄河，经过今河南省安阳、郑州、南阳，入湖北枣阳、随州、孝感、武汉、鄂州、大冶，再入江西省九江瑞昌市铜岭矿山铜矿遗址一带，再经南昌到樟树市筑城族居，自号“句吴”为方国。这条水陆并进路线，早中期为商代方国所控制，相对安全；但晚期由于方国各个部落各自为政，其风险很大。因此，商周之交，太伯奔吴的最佳出走路线，应是“商於古道”。

泰伯立吴，融合南北文明，为吴文化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泰伯、仲雍及其族人，与当地东夷后裔越人，共赴时艰，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建立城邑，为尔后吴国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

泰伯病逝后，无子，其弟仲雍立为吴仲雍，至仲雍曾孙周章时继立为君。周武王灭殷，求泰伯、

仲雍之后得周章，封为诸侯。从泰伯至寿梦十九世，即周简王元年（公元前 585 年），吴国称王，始有确切纪年。

在此前吴国为侯国时，为拓展疆域，国都从宁镇地区西北偏南，不断向东南几经迁徙，之后定于太湖东北岸的军政重邑姑苏（今苏州古城）。因这一带土地平旷肥沃，水陆交通方便，物产丰富，人口众多，时为东南古都会，就成了吴国都城的最初首选地。于此，吴王阖闾（公元前 514 年—公元前 496 年），命楚叛臣伍子胥（公元前 559 年—公元前 484 年），于阖闾元年（前 514）筑阖闾城，今常州市武进区雪堰镇有其遗址。

周灵王二十三年即诸樊元年（公元前 560 年），吴国国都从今江苏省江阴市境内迁都姑苏（还有一说是从江苏省无锡市梅里迁都今苏州）。其时已置郡、县，后历诸樊、余祭、余昧，王僚、阖闾五朝。65 年后的周敬王 25 年（公元前 496 年），吴王夫差登基，命大臣伍子胥在诸樊所筑城邑上，参照楚筑城技术，“相土尝水”“象天地法”^[6]，扩建大城。史载其周长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约 23.9 公里），亦名“阖闾城”，又称姑苏台。这也是吴国的最后一座国都城。

吴王阖闾重用大臣伍子胥治理内政，增设郡、县，发展经济，人口大增；重用孙武（公元前 545 年—公元前 470 年）为大将，军队强悍，国力强盛。其西与楚长期争战，北上伐齐，称霸中原。公元前 496 年，阖闾死后葬于苏州虎丘。

公元前 473 年，越乘吴伐中原，归国后“士皆罢敝”之际，伐吴，吴亡，“阖闾城”成为越国都城。公元前 306 年，楚灭越，越国亡，越人多散逃至东南沿海一带。周赧王五十三年（公元前 262 年），楚置江东郡，封黄歇为楚春申君，领 12 县为俸邑，吴县为其一。“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1]1874}“吴墟”即为今苏州无疑。

三、会稽及政区地名的由来、沿革、演变原因与吴文化的生成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秦灭楚江东郡置会稽郡，置吴县，郡域包括今江苏南部及浙江北部、皖南东部，辖 12 县，其中有吴、嚭二县在今苏州市境内。吴县以吴国名县，乃袭楚制，郡治吴县治（今苏州古城内）。

会稽郡,以会稽山为名。此山原名茅山,又名苗山、防山,在今浙江省东部,绵亘于绍兴、诸暨、东阳、上虞等县、市,近南北走向,长达100公里,海拔约500米。最高峰东白山在东阳、诸暨交界处,海拔1194米,盛产竹木,有禹陵、禹庙等古迹,为钱塘江支流浦阳江和曹娥江的分水岭。

会稽得名,与大禹南巡会集议政有关。

会,集合、会合。《庄子·养生主》:“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孟子·告子下》:“葵丘之会,诸侯束性戴书而不歃血。”皆释为此义。稽,停留。《书·酒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俞樾平议:“稽,止也。”《管子·水地》:“秦之水泔而稽,淤滞而杂。”尹知章注:“稽,停留也。”《说文·稽部》:“稽,留止也。”以上皆释为此义。会合而止,谓之会稽。

《元和郡县志·卷第二十六》,引《吴越春秋》云:“禹巡行天下,会计修国之道,因以会计名山,仍为地号。”^{[7]618}会稽,当为“会计”之音转。

西汉时会稽郡域扩大,东汉时缩小。西晋太康初为国,永宁元年(301年)国除为郡;南朝宋复为郡。隋开皇九年(589年)废,大业三年(607年)又改越州置,治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辖境约当今浙江省浦阳江(浦江县除外)、曹娥江及甬江流域。

东汉永建四年(129年),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治。三国时属吴。南朝梁太清三年(549年),改为吴州;大宝元年(550年)复为郡;南梁陈祯明元年(587年),复为吴州。郡、州因朝代更替而更之,皆以“吴”国号为名。秦置吴县后,今苏州及环太湖流域,以及浙北与皖南地域,皆可称为“吴地”。

吴地,历史文化源远流长,皆可考释。

吴越历史,最早可与北方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及南方河姆渡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相比。北方仰韶文化与南方河姆渡文化及大溪文化(公元前4300年—公元前3300年),处于同等发展水平。

地处江南呈碟形的太湖平原,因受气候和地势影响,沼泽遍布,河汉纵横,距今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4000年间产生的马家浜文化和尔后的松泽文化(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300年),不如

同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繁荣。

之后,太湖平原气候干凉,海平面下降,冈地散布,植物茂盛,各类湖面大大缩小,考古发现这些湖底有人类活动的遗迹和遗物。优良的地理环境和适宜的气候,催生了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马家浜文化晚期,称为崧泽文化(公元前3900年—公元前3300年),而良渚文化,则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8]486}。

在良渚文化遗址的不大范围内发现了十几处聚落遗址,其反映了当时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社会繁荣的状况。尔后,防风氏创造了钱山漾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600年),有虞氏约在公元前2000年,创造了广富林文化(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000年),从而取代了防风氏在今上海市一带的统治。

殷商时期,今苏州一带,为东夷后裔淮夷人方及虎方等部落族居之地。《左传·昭公十一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襄公四年》:“楚人既克夷虎。”以上应是指吴越地区的东夷后裔方国的情况。虎方,亦为宋时安州出土的《中鼎》所证实^{[9]64-71}。今江苏殷商时代的遗址显示,东夷、淮夷受到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并带有原住民文化的特征。考古发掘遗址群的系列发现,最终确证了宁镇地区、江淮之间与皖南东部范围的商周时期地区性文化——湖熟文化^[10]。

商周之交及周代,今苏州及太湖流域为周王朝封邑之地,笔者在《扬州地名源流考》一文中对此有所考述。周王朝地处中原,自称华夏。至春秋初,自定中原文化为一尊,称中原文化四周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甚至蔑称周边文化为落后文化。史实证明这种看法缺乏依据。我们要坦承,商周至秦汉间,中原农耕文化的确有比周边农耕文化先进的地方,但各地农耕文化各有千秋,各有所长,这是气候、地理、交通、物产等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发育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吴地文化,就是中原文化、楚文化、东夷古越文化综合孕育发展而成,是一种文明程度不亚于中原文化且具地域特色的文化。这种情况在两汉之后更为明显,更遑论东晋南渡之后。

隋开皇九年(589年),改吴州为苏州,治吴县,苏州辖吴县等5县。苏州地名,自此始载国史、地志。

四、苏州(姑苏)政区的地名生成、沿革及演变

苏州，何以名之？《元和郡县图志·苏州》：“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7]600} 苏，指姑苏山；州，区划名。隋开皇三年（583年），罢天下诸郡，以州统县；隋唐时，多以州、郡统县；至元代，郡名废，郡、县制改为州、县制。

姑苏之称，最早见著于《国语·吴语》^[1]。尔后《韩非子·喻志》《墨子·非攻中》皆载“姑苏”之名。《吴越春秋·阖闾传》及《勾践伐吴外传》《越绝书》《潜夫论·边议》载“姑苏”为“姑胥”，而《淮南子·览冥训》载为“姑余”。高诱注：“姑余，山名，在吴。”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时苏州称为“姑苏”，至东汉时乃称“姑胥”或“姑余”。

姑苏，何以得名？“姑”为古越语发音词，无义，这得到现在多数学者的认同；而“苏”则各有不同解读，历有三说。

一说“苏”字，从草从鱼从禾。从草示意植物茂盛；从鱼，示意捕鱼；从禾则表示庄稼丰收。“苏”字，即为江南鱼米之乡之义。

这有望文生义之嫌。经清代学者考证，汉字拆字法，始于东汉，实则始于《说文》。如《说文·邑部》：“邛，国也。”意为公元前486年吴国筑的城邑，原为干国于此筑城，春秋时被吴所灭，故从干从邑谓之“邛”。《说文·邑部》载有“邦”“邢”“郑”等字，皆属此况。“姑苏”为古越语华夏文译音，最早源于春秋时期，用汉语拆字法去解释古越语“苏”字，纯属臆测。

二说以女巫歌舞祭祀台为名。唐善纯先生认为，在东南方沿海汉语方言中，有一个古越语的底层，苏州古称“姑苏”就是一个例子。他考证后认为“姑苏”的“苏”来源于古越语，其义为姑娘、处女、女巫、青年女子。阖闾在姑余山建姑苏台，与女巫及美女歌舞祭祀有关。

笔者认为，释“苏”为祭祀的少女（美女），一是缺乏先秦两汉古文献记载，即使作者引《楚辞·拓魂》《吴越春秋·夫差内传》《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史记·秦本纪》等古文献相关记载，但仍是引申之说，并无明确记文；二是缺乏相关出土文物及遗址、遗物佐证。因此，此说虽有一定

依据，但考释仍嫌不足，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说“姑苏”以地势地物而得名。周生春《姑苏考》一文认为，从史料看来，姑苏就是姑胥，并引《国语》《史记》《吴越春秋》《越绝书》为证。他进而认为，“姑苏，姑胥应作苏山、胥山解，姑含有山义。”并引《山海经·中山经》为证。苏、胥两字，乃一声之转，并引《说文》《广韵》而释其音义，明“苏”为草木，明“胥”为树名。他由此得出结论：“上古时代，姑苏（姑胥）大约兴旺地生长着一种称苏或香的植物，山即因此而得名。”^[12]

这是最早以地势地物释“姑苏”之说，有启迪作用；然而，此说也难圆其说。一是“姑苏”地名，始于春秋，用战国秦汉时中华夏文、汉语释义古越语“姑苏”（姑胥）地名，缺乏历史渊源与文化依源；二是从出土文物看，今苏州一带是越国文化地，并非吴国文化地，而出土文物，皆为春秋晚期越人墓葬及文物。

笔者认为，姑苏之“苏”，极可能为越语城邑台、宫地名。

其一，史载古越人先祖防风氏，是一个善治水筑城邑的部落。世传伏羲（太皞）后裔，族居在今浙江一带的防风氏，创造了钱山漾文化类型，约在公元前4300年左右，其取代了良渚文化。公元前4200年左右，南下的有虞氏文化又取代了防风氏文化。从广富林文化遗址，可以看出这两种文化取代的状况^{[9]64-71}。从现有出土文物看，从南荡、广富林、钱山漾，到点将台、马桥文化，均发现了大量与防风氏古文化遗存相关的聚落及城邑。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因素南渐，甚至部族南迁的历程，其中也可证实《史记·五帝本纪》所载“禹东巡守，至于会稽而崩”所言不虚，有其历史渊源。

其二，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00年）是古越人创造的地域文化，良渚古城遗址因其筑城技术被誉为“中华第一城”。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13]。钱山漾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600年）及尔后的马桥文化（约公元前3330年至夏商青铜时代）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其聚落遗址建筑技术的高超有目共睹^{[8]374}。马桥文化的印纹陶与纹饰，当是古越人创造的早期文化，其在春

秋战国时期属典型的越人硬陶文化,但同时兼具今山东岳石文化及中原二里头文化因素。其时的城邑及聚落建筑技术,较钱山漾时期更为先进。越国建都会稽之前的早期越国都城,在古钱塘以北的太湖南岸,即秦汉时期郾郡治安吉古城(今浙江杭州市安吉县递铺街道办事处九龙山下古城村)^[14]。

1973年发现的江西樟树市吴越遗址,为长江以南最早的越人商代遗址,距今3500年,为商王朝南方著名方国(都邑)所属。其出土了大量文物,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2012年5月13日《湖南日报》报道:湖南永州市零陵区发现迄今最早“土著”古越人聚居地,距今有三四千年的历史。由此推断,越人先祖及古越人部落方国,都善立聚落、治水、种稻、养殖、筑城邑。

其三,姑苏之“苏”,实为城邑台、宫之义。《墨子·非攻》:“(夫差)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孙诒让诂:“按《国语》以筑姑苏为夫差事,与此书正合。”《国语·越语下》:“吴王帅其贤良与其重禄,以上姑苏。”韦昭注:“姑苏,宫之台也,在吴阖门外,近湖。”《越绝书·外传记吴地传》:“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苏之台,以望太湖。”以上文中“台”当指宫殿之台,即城邑台、宫建筑物。

台、宫,在《国语·周语上》《韩非子·难二》《史记·吴太伯世家》等典籍中,指帝王或重臣的建筑群及房屋为台、宫者。苏,本义作紫苏等植物,杨雄《方言》引为“悦、舒”之义,“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之说。“馆娃之宫”,即是祀祭女巫与美女所居之宫,实指“姑苏”之台(宫殿)。吴王夫差筑规模宏大的馆娃宫,日夜享乐,不理朝政。这与阖闾大城附近“姑苏台”地名义项相合。由此可知,姑苏之“苏”,越语即指城邑之台、宫建筑物。

隋、唐间,苏州时而称吴州、吴郡,时而称苏州,6次后而复故名^[15]。宋开宝四年(971年),南唐去国号改为江南国;开宝七年(974年),宋伐江南国,开宝八年(975年)宋以吴越孙承佑为平江节度使。江南国平定后,以“平定江南”之意为名。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苏州升为平江府,属两浙路。元至元十三年,改为平江路,属江浙行省。明初改为苏州府,清代因之。以后苏州政区名称不改,境域累调,治所未迁。

综上所述,苏州地名的别称皆有地名渊源、流变原因可考;泰伯、仲雍南奔荆蛮的路线及族居何处、地名渊源及其地望皆可考;会稽及政区地名的由来、沿革、演变及其原因亦可得到解释;苏州政区地名的生成、沿革及演变过程,尤其是“姑苏”作为古越语华夏文译写地名的本义中的疑难、重点问题,也可以进行详考。

参考文献:

- [1]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
- [2] 苏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苏州市志[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14.
- [3] 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509.
- [4] 叶文宪.关于苏州历史地理的几个问题[J].铁道师院学报(自然科学报),1989,6(S1):43-44.
- [5] 谢忱.勾吴国都的变迁新探[J].常州工业技术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9(1):56.
- [6] 赵晔,应劭,崔鸿,等.野史精品:第1辑[M].长沙:岳麓书社,1996:18.
- [7]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8]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
- [9] 翟杨.广富林遗址广富林文化的分期和年代[J].南方文物,2006(4).
- [10]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59.
- [11] 左丘明,刘向.国语·战国策[M].长沙:岳麓书社,1988:173.
- [12] 周生春.姑苏考[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S1):126-128.
- [13] 浙江省委省政府电贺“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N].浙江晚报,2019-07-06(1).
- [14] 程亦胜.早期越国都邑初探:关于古城遗址及龙山墓群的思考[J].东南文化,2006(1):31-39.
- [15]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编纂委员会.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438.

责任编辑:黄声波